



聖竹不用愁心平舞  
自然任化風雨兩童愁自翩

主編：何達

# 何遂遺蹟



可  
達  
書  
院

卷之三

主編：何達

# 何遂遺蹟



# 紀念何遂先生誕辰120週年

# 何遂遺蹟



編委會主任：何康

編委會成員：

何世庸 李智勤 韓蘊 何康 郁雋民  
何嘉 何達 趙志勤 何仲山 劉友于  
何敏 杜清泉 雷蓉 何迪 王苗

主編：何達

總策劃：何迪

出版人：王苗

副主編：何仲山

裝幀設計：李明元

攝影：朱建輝

校對：潘琼來

監製：姜建

出版：中國書局

地址：香港黃竹坑道25號甄記大廈6B  
電話：(852) 2590 8929 傳真：(852) 2590 8926

印刷：香港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ISBN 978-962-8785-45-2

版次：2009年1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數：1,000冊

定價：HK\$180.0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78-962-8785-45-2



9 789628 785452

主編：何達

# 何遂遺蹟





# 傳奇人赤子心



何遂1962年攝於海南島三亞海濱礫灘



# 傳奇人、赤子心

(代序)

何 嘉

父親辭世四十年了，我很想念他。

父親一生愛國，富有正義感，為人正直、豪爽、熱情、俠義，可以說是一個生於亂世滿懷赤子之心的傳奇人物。

父親一生在政治上是敏銳而清醒的。從參加辛亥革命到抗日；從不滿到反對蔣介石；從同情、支持共產黨到直接為黨工作，父親的思想始終站在時代的前沿。他是一個富有民主思想的愛國者，他畢生的信念就是振興中國。

父親出生的1888年，正處於中華民族飽受列強欺凌積貧積弱的清末。他16歲從軍反清，19歲加入中國同盟會，21歲畢業於保定陸大第二期，他是廣西同盟會創建人之一。他滿腔熱血忘我地投身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洪流。辛亥革命中，他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分子，翻開那段歷史，許多親歷者的回憶中都寫到他。

在武夫當國的軍閥混戰時期，父親參與了護國、護法鬥爭。抱着「以軍閥制軍閥」的模糊思想，投身直系，參與了1924年馮玉祥、孫岳、胡景翼發動的「北京政變」。在他36歲時，當上了國民軍空

軍司令、國民軍第三軍（軍長孫岳）參謀長；也被北京政府任命為航空署署長，授銜空軍中將。按說算得上風光一時，但他對此並不在意，一心幻想把

國民三軍帶到甘肅新疆去割據，實現他的改良夢。結果和他義結金蘭的摯友孫岳鬧僵，獨自離開了國民軍。

中國歷史走進蔣介石集團為主導的國民黨統治時期。北伐戰爭中，父親遵照蔣介石的指令，到河南去策

動吳佩孚的主力倒戈響應北伐。應該說，蔣介石對交遊廣闊以「當代魯仲連」自命的父親是不錯的。先後任命他為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代校務」（代校長、副校長主持校務）、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高官。父親對蔣的不滿，主要起於抗日。父親是個民族意識極強的人，對日本軍閥的侵略痛心疾首，不共戴天。「九一八事變」後，他與朱慶瀾共同組建「遼吉黑抗日義勇軍民眾後援會」，自己「毀家紓難」變賣古董字畫充作抗日軍餉，還代表「後援會」和孫科到熱河去敦促湯玉麟整軍抗日。自己又請纓殺敵當了55軍軍長，險些被進



何遂、陳坤立1912年於南京李相府喜結秦晉  
此為1962年所拍金婚紀念照

攻熱河的日寇打死。蔣介石對日本軍閥入侵的一再妥協使他很反感，正是在抗日這面民族大旗下，西安事變後，他開始靠攏中國共產黨。

1937年5、6月間，當周恩來、博古等中共中央代表到南京時，經張沖安排，他和周恩來等有了接觸。「七七事變」後，葉劍英、博古、李克農等共產黨人與父親交往漸多；1937年9月，父親還專程陪同周恩來從第一戰區到山西去，協調閻錫山與八路軍的關係。父親和共產黨的交往是很真誠的。國共剛開始合作抗日，在南京，他聽葉劍英對他說，中共代表駐地警衛缺少槍支，他立即將家中所存四支步槍兩支駁殲槍連同子彈全部相贈；皖南事變後，他得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經濟困難，立即送去一筆現款。也許有人覺得這不算甚麼，可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這種雪中送炭的真情，是多麼難能可貴啊！

我和父親接觸最多的時候是1949年。這一年，

黨組織兩次讓我伴隨父親，協助他工作。一次是在寒冷的一月，我隨父親從香港到漢口，按照黨的要求，父親三次會見白崇禧。他們在白的臥室談話，我就坐在外間客廳等。完成任務後，返程路過南京，父親又主動地去見「代總統」李宗仁（父親與李宗仁、白崇禧有師生之誼），勸他真誠和共產黨和談息兵，避免繼續生靈塗炭。另一次是四月隨父親從上海赴廣州，後轉台灣工作。八月在台北父親和吳石伯伯接觸密切。為了人民解放事業和避免祖國的分裂，吳石甘冒斧鉞，同意繼續為共產黨工作。我們並在香港協助吳石和黨組織接上了關係。這段生活很特殊，由於工作關係和環境險惡，我和父親的關係有了不尋常的變化，我們既是父女，又是為完成一個共同任務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戰友。這真是一個奇妙的組合。父親一生很多事情讓我感動，父親的音容笑貌，愛國情懷，待人的真誠



1951年攝於上海，此乃新中國建立後首張家人合影。何遂、陳坤立居中坐，環立者左起為何嘉、何世平、何世庸、何康、何達

俠義，永遠銘刻在我心間。

父親的記憶力極強，可以成篇地背誦《左傳》和《戰國策》。他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詩詞書畫在他生活中已不可或缺。畫畫送人是他的樂趣，動輒有詩，出口成章。我一直認為，父親的文才遠勝於他從政之資。父親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就開始文物收藏和考古。他收集的秦漢瓦當逾千，親自拓片彙成三十餘冊；他的《何敘甫藏甲骨文》有郭沫若作序；他的《敘圃甲骨釋略》有商承祚、陳獨秀題詞。他收藏的大量文物先後都捐獻給了幾個地方的博物館。僅1950年捐獻給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的文物就達6,895件。他沒有給子孫留下一件文物。他在1943年作的《校經圖序》（見百年敦煌文庫文獻卷）中，對文物國有，文物的保護、管理等提出了一系列極有見地的見解。他自己就是一個忠實的實踐者。

父親最難得的是，歷經滄桑卻始終保持一顆透明的赤子之心。他的言行有時像個孩子。1957年「反右」熱潮中，我二哥何世平（在全國人大辦公廳工作）接到同事的電話，說當天部分人大代表批判右派分子黃紹竑的會議上，正群情激憤，父親突然離席，到小賣部買了一盒冰激凌，在眾目睽睽下送到被批得滿頭大汗的黃紹竑面前。二哥立即約同我的愛人鄧裕民趕到父親家，對老先生進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他們兩人當年被家人戲稱為「救火隊長」。

在家庭裡，父親事母至孝，關愛弟兄；對子女則是一位真正的慈父。民主平等，慈愛有加。他心中早知自己的兒女是共產黨，但並不說破，只是默黓從旁協助、掩護。有一次，我三哥何康在客廳讀

《聯共（布）黨史教程》，隨手將書扔在沙發上。父親拾到後，提筆在書的封面上寫下「他山之石」四字，並簽上自己的名字，仍置於客廳。我想，父親在家中所以這樣，是他既深受傳統道德的熏陶，早年又遍遊歐美，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潮影響的結果。這也是兒女和孫輩特別愛戴他的一個原因。

解放後，父親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司法部部長，是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法案委員會委員。每年人大都要組織代表到各地參觀考察，父親看到祖國欣欣向榮的建設非常高興，創作了大量讚美新中國的詩畫。但對一次次過「左」的政治運動很不理解。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當了一回諍友，講了一些逆耳諍言。從他晚年的一些詩作中，也可以窺見他內心的困惑。1968年1月，他安詳地離開了人世。

我的弟弟何達，1954年詳細記錄了父親口述的生平經歷。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此後生活相當坎坷，但仍陸續寫了一些關於父親的文字。近兩年，在第三代何迪、王苗的策劃組織下，全家親人同心協作，這本《何遂遺蹟》終於出版了。我們要說，不是為了紀念而紀念，只是為了留下一些有益的作品和史料。朋友，請讀讀這本書，在這裡，可以看到近現代歷史的若干側影，也可以感受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

# 悼念我的父親何遂

(代生平簡介)

何 達

原載1985年2月24日《人民日報》



何遂出席三屆全國人大會議使用之標準照

父親病逝十七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現在我眼前。

父親字敘甫，福建閩侯人，1888年生。

1904年，父親進入福建武備學堂，結識了林覺民、方聲洞、陳更新等，開始參與反清革命活動。1906年，他到南京在第九鎮當排長。1907年，父親考入了河北保定陸軍隨營軍官學堂（後改稱陸軍大學）。這年，由方聲濤主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1909年秋，父親在陸大第二期畢業後隨耿毅等一批青年志士，到廣西訓練新軍的機構「督練公所」參謀處擔任籌略科科長兼陸軍幹部學堂教官。1910年，他和耿毅、劉建藩、楊明遠等幾位同盟會會員創建了同盟會廣西支部，耿毅為支部長，父親為參議，趙正平為秘書長。在桂林福棠街二號設立機關，積極發展組織，出版《南報》（後改為《南風報》）宣傳革命。

武昌起義爆發時，父親是清軍北洋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的參謀。吳祿貞是革命黨，在北方軍人中頗有聲望。山西宣佈獨立後，清廷任吳為山西巡撫，命他攻取山西。吳祿貞派父親和協統吳鴻昌率部進駐石家莊。清廷電促吳鴻昌進攻娘子關，父親得悉山西革命黨實力空虛，便利用吳鴻昌畏葸不前和首鼠兩端的心理，用緩兵計阻止了進攻。吳祿貞抵石家莊後，派父親到山西去聯繫，消除了閻錫山的顧慮，父親又隨吳祿貞到娘子關與閻錫山會晤，組成燕晉聯軍，推吳為大都督，閻副之。當時，吳祿貞已與駐灤州的二十鎮統制張紹曾、混成協協統藍天蔚有約，準備同時起義，直取北京，並接受父親獻策，扣壓清軍運送輜重的列車，截斷了北京通往漢口前線的鐵路交通。因此，吳祿貞的存在，對清廷和袁世凱構成極大威脅，這是吳祿貞被刺殺的背景。吳祿貞在石家莊火車站被刺的那個晚上，父親宿於隔壁屋子裡，聽見槍聲後衝出去，吳的人頭已

經不見了。父親對我說，慌亂中他沒有找到手槍，只拿了一把短劍，看到吳統制被害，悲憤到極點，曾用短劍自刎，那把劍恰恰沒有開口，很鈍，把他的脖子割破了，血流了下來，疼痛使他猛醒：不能這樣死，要繼承吳統制的遺志。父親率領第六鎮部分官兵宣佈起義，被推為燕軍大都督，他抱着失去人頭的吳祿貞的屍體到娘子關。閻錫山對他說：「如今燕晉聯軍仍然存在，我比你年長幾歲，也不客氣，我就擔任聯軍大都督，你屈任副都督吧。」父親只求他厚葬吳祿貞。吳的墳後來修在石家莊火車站旁，立了很大的碑，碑文中記下了父親這段經歷。

辛亥革命時期，年輕的父親充滿了反對封建帝制的革命激情和忘我的犧牲精神，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是走在時代潮流的前面的。父親對辛亥革命的結局很失望，隨着清王朝的覆滅，他在政治上也失去了明確的奮鬥方向。

1915年，父親應黎元洪的邀請，到陸軍大學任戰術教官，與李濟深同事，他們從此相交甚契。雲南「護國戰爭」發動後，父親潛往山西大同，策動晉北鎮守使孔庚通電反袁，電文是他起草的。這是北方首先起來反袁的。結果，孔庚被閻錫山抓起來，父親則由山西警備司令胡謙「陪送」出境。袁世凱死了，黎、段政府派父親和沈鴻烈、鄭桓等為代表，赴歐洲觀戰，父親到過法、意比前線，並去過英、美等國。歸國後，寫了一本《歐洲觀戰記》。這段生活以及父親1913年去日本考察學習的經歷，對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發展，是有影響的。「護法運動」時，父親曾由廣州「護法」政府委任為「靖閩軍司令」，在福建從事倒李厚基的活

動，失敗後，再次東渡日本。1920年父親經直系軍閥曹錕衛隊旅（十五混成旅）旅長孫岳引進，做了曹的軍官教導團的教育長。1924年，馮玉祥聯合孫岳、胡景翼發動「北京政變」，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建立國民軍，通電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國是。父親作為孫岳的參謀長和摯友，始終參與策劃和行動。國民軍時期，他任第三軍參謀長、第四師師長（第三師師長是楊虎城將軍），還擔任北京政府的航空署長、國民軍空軍司令。國民軍中聘有幾十名蘇聯顧問，父親受了一些影響。他當時極力勸說孫岳離開中原、華北，把有限的軍隊帶到甘肅、新疆去，取得蘇聯的援助，實行軍事割據，由此來實現他的資產階級政治主張。孫岳對此最初是同意的。軍隊已經由陝西向甘肅進發，可是後來，孫岳變了卦，決定回去就任直隸軍務督辦兼省長，父親和他鬧翻了，於是拂袖而去。

北伐戰爭時期，父親賦閒於杭州，蔣介石派陳銘樞把他找到南昌，蔣讓父親回河南去，利用舊關係，運動直系和曾屬國民軍系統的軍人倒戈響應北伐，父親照辦了。1928年春，父親應李濟深的邀請，到廣州擔任李的總參議，5月繼李濟深擔任黃埔軍官學校的代理校長，稱「代校務」。到1929年底，因蔣介石已在南京另設軍校，黃埔軍校的經費日益困難，父親憤而辭職，到西安去了楊虎城將軍十七路軍的總參議。

「九·一八事變」的炮聲，震醒了父親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和對日不抵抗，放棄東三省的賣國行動，十分反感。1932年春，他在北平，與朱慶瀾將軍一起組織了「遼、吉、黑抗日義勇軍民眾後援會」，朱任會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何遂伉儷攝於南京

長，他任副會長兼主任幹事。父親以極大的熱情，到處奔走呼號，演講抗日、募集捐款。他自己也毀家紓難，捐款四萬元，並多次到熱河前線慰勞抗日義勇軍，還拍過一些紀錄影片。但是，由於反動派的破壞，「後援會」被迫撤銷，父親不僅受到許多莫須有的指責，連我們在北平察院胡同的家，也遭到一群有政治背景的「強人」的搶劫。

西安事變發生後，宋美齡曾讓蔣介石的侍從室副主任林蔚（林是父親的學生）找過父親，要他設法利用和楊虎城的關係，保護蔣介石的安全。當時父親雖曾找過沈德慶計劃飛往西安，但他內心認為蔣是活不成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出乎父親意料，使他更看清了：真正從民族大義出發，愛國抗

日，富有政治遠見的是中國共產黨。他熱誠擁護槍口對外，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7年，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南京後，他結識了周總理、葉劍英、博古、李克農等中央領導同志。父親當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是個亦政亦軍和各方面聯繫很廣的職務，他在各種會議和交往中，堅決擁護國共合作，一致抗日。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很真誠、很熱情的；我黨領導同志也把他看作是真誠的可以信賴的朋友。父親講過這樣幾件事：周總理和他見面時，稱讚他同馮玉祥將軍等組織國民軍，電迎孫中山先生北上議政，是進步的行動，希望他能為團結抗戰多做貢獻。他非常高興，立即通過孫科上書蔣介石，要求擔任國民黨駐十八集團軍代表，未被蔣採納。先前，父親常到老虎橋監獄去看望陳獨秀，並與陳合寫了一本關於日本片假名來源的小冊子，被列入中山文庫。周總理委婉地勸他不要和陳交往過密，他接受了。當時，國民黨釋放了一批政治犯，有許多剛從監獄裡出來的衣衫襤褛的同志紛紛聚到傅厚崗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國民黨中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便謠傳共產黨要暴動。那時南京市市長馬超俊是孫科的親信，父親受葉劍英同志委託，特為此事向馬作了解釋。有一天，父親在家裡宴請中共代表團，葉劍英同志告訴他，中共代表團駐地要加強警衛，缺少槍支，他立即讓我兩個哥哥把家中的四支長槍和兩支手槍送到十八集團軍辦事處。

程潛將軍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父親任第一戰區高級幕僚室主任。這期間，他曾陪同周總理乘一輛小汽車由河南前線赴山西五台山八路軍總部，在路上數日交談中，父親深獲教益，對抗戰形勢及

中共的主張有了更深的瞭解。在山西境內，公路被日機炸毀，父親讓副官到村裡去找老鄉搶修，一個人也沒有找來。周總理笑着對秘書說：「你去，你去。」不久，就找來了一群鄉親，總理親自和他們一起搬石填坑，有說有笑，使父親大為驚訝。後來，他多次對我們談及此事，一再讚嘆：「共產黨真會做群眾工作。」這次在五台山八路軍總部，父親見到朱總司令、彭德懷將軍等，相談甚歡。他利用同閻錫山的舊關係調解過八路軍與閻的矛盾。當時八路的給養較差，他對閻錫山說：共產黨在前面替你擋着日本人，既然是聯合抗日，不讓別人吃飽穿暖怎麼行呢？他還通過當時在軍令部任要職的林蔚去疏通，給八路軍增加了一些軍餉。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父親對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做法是不滿的。在重慶，父親和母親曾一起去拜望過周總理和鄧穎超同志，鄧穎超同

志還親切地問到他們子女的情況，給予慰勉。1939年年底，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間，葉劍英同志曾由我大哥和三哥陪同去雲莊找過父親，請他向山西有關軍政人士說明我黨抗日救國的宗旨，要求制止摩擦。父親即向山西駐渝辦事處處長孫煥庸等做了工作，間接宣傳了黨的主張。

1940年夏，因淮、瀘鹽被日軍控制，陝中、豫西地區食鹽供應緊張。國民政府鹽務總局局長繆秋杰想從陝甘寧邊區運花馬池鹽接濟。繆是父親的好友（後為兒女親家），通過父親和葉劍英同志聯繫，葉帥認為：此事對抗日統一戰線有利，而且將花馬池鹽外銷，換取邊區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對增加邊區財政收入，活躍經濟也是有利的。經父親介紹，繆秋杰在重慶海關宴請董老、葉帥、博古同志，父親作陪。席間商妥，由我大哥以鹽務總局代表身份赴邊區洽辦。此事得到了較圓滿的解決，客



五十年代，何遂伉儷  
攝於廣州何世庸家

觀上破壞了反動派對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封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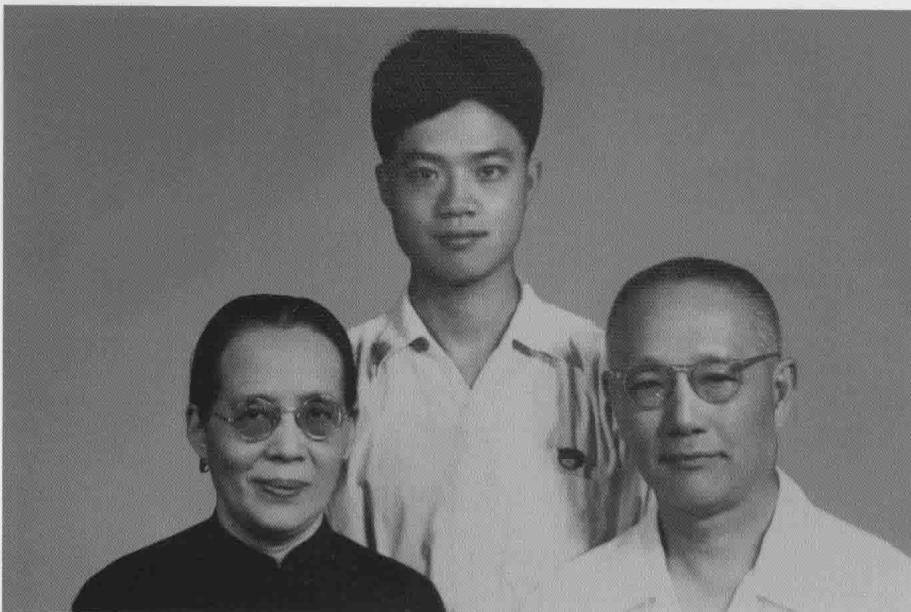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董老經我三哥轉了一封信給父親。他從信中得悉八路軍辦事處經濟上有困難，不顧當時政治局勢的險惡，親自與繆秋杰先生驅車前往曾家岩周公館，見到董老，向他表示了對蔣介石破壞抗戰的不滿，並面交一筆現款。後來，董老、葉帥送他們延安生產的毛毯、衣料作答，這毛毯父親一直珍藏在家中。

抗戰勝利後，父親對蔣介石發動內戰是反對的，他目睹蔣管區黑暗腐敗，民不聊生的現實，從幾十年的切身感受中認識到：只能把振興中國的希望寄託於中國共產黨。解放戰爭時期，他與劉曉、張執一、劉長勝等同志經常接觸，對黨託付的任務總是積極、認真地去完成。

解放後，父親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司法部部長、政法委員會副主任，是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他擁護社會主義，

擁護黨的領導，對祖國面貌的巨變是衷心喜悅的。他六十歲時患心冠動脈血栓症，1952年復發，住在上海華東醫院，他認為自己生命即將結束，特地把負責上海統戰工作的陳毅同志請到醫院，當面對某些黨員的作風問題等提出了尖銳的意見。事後又覺得有些話說過了頭，心裡很不安，病情更趨嚴重。這時候，陳毅同志到醫院去看望了他，懇切地對他說：你是我們黨的老朋友，我們把你當作老同志、老幹部一樣看待，希望你安心療養，戰勝疾病。父親心上的疙瘩解開了，他很感謝陳毅同志的關心，後來，在醫護人員的精心護理下，居然渡過危險期。1954年，他在太湖療養時，陳毅同志看了他的詩稿，曾寫了一首詩送給他，並將自己的近作《莫干好》一詞抄贈給他，父親非常高興，把陳毅同志的贈詩裱在自己詩集的卷首。

對於五十年代即已出現的一些過左的做法，父親感到不理解，苦悶，甚至痛心。他的一些親友，



何遂、陳坤立與何達  
1957年8月攝於北京

在歷次運動中受到衝擊，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他晚年的心情是不平靜的，但對未來是樂觀的，始終沒有動搖過對中國共產黨的信賴。他寫過許多舊詩詞，歌頌祖國的變化，歌頌黨；他畫了許多國畫，把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傾注於筆端。

父親離去十七年了。他不是一個完人，但他的愛國思想，民主精神，待人的耿直、熱誠，特別是他和黨的親密關係，給子女的影響是很好的。1979年夏，李世璋同志曾給我講述過這樣一件事：1937年，他就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秘書長兼政訓處長後，赴南京公幹，程潛先生要他催我父親趕緊到前線蒞職（父親當時任第一戰區高級幕僚室主任）。李到南京普陀路我家時，葉帥正看父親為他作畫，父親即興揮毫，也為李畫了一幅青松。吃午飯時，葉帥把我大哥拉到李世璋同志面前說：「這個青年人交給你，讓他跟你去。」就這樣，我大哥世庸、二哥世平都到了漢口前線，並先後分道赴延安，進了抗大。1939年，三哥也要由重慶去延安，父親對周總理說：我已經有兩個兒子到延安去了，老三再走，我就呆不下去了。周總理讓博古同志把何康找到機房街八路軍辦事處去談話，把他留下了。後來，他們兄弟三人都在國民黨統治區做地下工作，我的姐姐何嘉，嫂子繆希霞也在解放前加入了共產黨，參加了革命工作。父親以他的社會地位和朋友多、學生多的有利條件，掩護並協助他們開展工作。

父親一生不近煙酒，唯酷愛書畫、文物，他沒有給子女留下任何金錢和物質遺產，這是我們要感謝他的。他的唯一的財產就是大量的古文物和圖書，全部先後分別捐贈給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歷史博物館、南京博物館和天津市圖書館了。僅1950年捐

贈給上海歷史博物館的古文物就有六千八百九十五件。為此，陳毅市長、潘漢年、盛丕華副市長曾專函致謝，中央文化部發給了褒獎狀。

父親晚年，最惦念的莫過於祖國的統一，他常常思念在台灣的親屬、舊友、學生，一直盼望能和他們團聚。今天，在悼念父親的時候，我衷心希望父親的這個遺願能夠早日實現。